

主编 李天纲  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
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·历史学（第一辑）

*Histoire des mongols, depuis tchinguis — khan jusqu  
a timour bey ou tamerlan*

# 多桑蒙古史（上）

〔瑞典〕多桑(C. d'Ohsson)著 冯承钧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
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



# 民国西学：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

——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序

李天纲

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，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。来自欧美的『西学』，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，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。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，与当地文化交流信息，激发思想，乃至产生新的理论，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。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，公元九、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，有一场著名的『百年翻译运动』之外，还有欧洲十四、十五世纪从阿拉伯、希腊、希伯来等『东方』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，汇入欧洲文化，史称『文艺复兴』。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『西学』，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，称之为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并不过分。

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，其实早有前奏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说：『自明末徐光启、李之藻等广译算学、天文、水利诸书，为欧籍入中国之始。』利玛窦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，比清末的『西学』早了二百多年。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，利、徐、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、历算等『科学』著作，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《论灵魂》（《灵言蠹勺》）、《形而上学》（《名理探》）等神学、哲学著作。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『西学东渐』之始是对的，但他说其『范围亦限于天（文）、（历）算』，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，直到今天。

从明末到清末的『西学』翻译只是开始，而且断断续续，并不连贯成为一场『运动』。各种原因导致了『西学』的挫折：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；受清初『中国礼仪之争』的影响；欧洲在1717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，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。鸦片战争以后很久，再次翻译『西学』，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。从翻译规模来看，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、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，影响力却仍然有限。梁启超说：『惟（上海江南）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，李善兰、华蘅芳、赵仲涵等任笔受。其人皆学有根底，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，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、李。』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，但说『戊戌变法』之前的『西学』翻译只在上海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零散从事，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，则是事实。

对明末和清末的『西学』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：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，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『西学』，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『翻译运动』。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，数以千计的『汉译名著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。1905年，清朝废除了科举制，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『大学堂』的方式举行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『书院』系统改造而成。新建的大学、中学，数理化、文史哲、政经法等学科，都采用了翻译作品，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，于是，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，即在『四书五经』之外，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『西方经典』，甚至到了『言必称希腊、罗马』的程度。

我们在这里说『民国西学』，它的规模超过明末、清末；它的影响遍及沿海、内地；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，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、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，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，但从一般直觉来看，是可以成立的。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，以及『现代化』、『世俗化』、『理性化』，都与『民国西学』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。然而，『民国西学』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？它是一

个怎样的体系？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？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，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还有，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，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？『西学东渐』的代表，明末有徐光启，清末有严复，那『民国西学』的代表作在哪里？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，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，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的『西学』著作，束之高阁，已经好多年。

举例来说，1935年，上海生活书店编辑《全国总书目》，『网罗全国新书店、学术机关、文化团体、图书馆、政府机关、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』。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，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，分为：『总类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宗教、自然科学、文艺、语文学、史地、技术知识』。一瞥之下，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『人大图书分类法』更仔细，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、学说、学科、流派更庞大。尽管并没有统一的『社科规划』和『文化战略』，『民国西学』却在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查看《全国总书目》（上海，生活书店，1935），在『社会科学·社会学一般·社会主义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社会主义概论、社会主义史、科学的社会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基尔特社会主义、乌托邦社会主义、基督教社会主义、议会派社会主义』等；在『社会科学·政治·政体政制』的子目录下，列有『政治制度概论、政治制度史、宪政、民主制、独裁制、联邦制、各种政制评述、各国政制、中国政制、现代政制、中国政制史』等，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真的是与欧美接榫，与世界同步。1911年以后的38年的『民国西学』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而我们却长期忽视，不作接续。

编辑出版一套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，对于我们估计、认识和研究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、『中国的文艺复兴』，接续当

时学统，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。1980年代初，上海、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、庞朴先生为代表，编辑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『中国文化史丛书』，重振旗鼓，『整理国故』，先是恢复，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。遗憾的是，最近三十年的『西学』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『接续』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，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，诸如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……还有『老三论』、『新三论』、『后现代』、『后殖民』等等新理论，对『民国西学』弃之如敝屣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，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，单靠『严译八种』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，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，几份报刊的主笔。但是，像王造时（1903-1971）先生那样在『西学』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，然后借此『西学』，主编报刊、杂志，在『反独裁』、『争民主』和『抗战救国』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。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《历史哲学》、摩瓦特的《近代欧洲外交史》、《现代欧洲外交史》、拉铁耐的《美国外交政策史》、拉斯基的《国家的理论与实际》、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。1931年，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，文学院院长，政治系主任，后来创办了《主张与批评》（1932）、《自由言论》（1933），组织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』（1932）。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、法治、理性的自由主义；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、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（见王造时著《荒谬集·我们的根本主张》，1935，上海，自由言论社）。非常可惜的是，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、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，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，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，读不到，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。

我说，『民国西学』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，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『断裂』之后，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，哪些可以继续和发展，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。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，我

们都没有再去翻看，认真比较，仔细理解。『改革、开放』以后，又一次『西学东渐』，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『西学』，用新的取代旧的，从尼采、弗洛伊德……到福柯、德里达……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：『熊瞎子掰包谷，掰一个丢一个。』中国学者在『西学』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，在层出不穷的『西学』面前特别害怕落伍。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：更新的理论，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，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，或者借用，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这种实用主义的『西学观』，其实是一种懒惰、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，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。

讨论二十世纪的『西学』，一般是以五四『新青年』来代表，这其实相当偏颇。胡适、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『西学』，倡导『启蒙』时居功至伟，但是『新文化运动』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，也使得这一派的『西学』浅尝辄止，比较肤浅，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『民国西学』。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有一个宗旨是要『输入学理』，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、人文学科知识，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，说『我们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便曾经发行过一期『易卜生专号』，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，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《易卜生主义》。《新青年》也曾出过一期『马克思专号』。另一个《新教育月刊》也曾出过一期『杜威专号』。至于对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日耳曼意识形态、盎格鲁·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，也就习以为常了。』（唐德刚编译：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，北京，华文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91页）。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，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『真理』的轨迹。三四十年间，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，到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；从不列颠宪政学说，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、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，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，大致就是『输入学理』运动中的全部『西学』。

胡适一语道破地说：『这些新观念、新理论之输入，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

问题。』胡适并不认为这种『活学活用』、『急用先学』的做法有什么不妥。相反，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『西学』的方法论，大多认为翻译为了『救国』，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赢仗，这就是『天经地义』。今天看来，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『实用主义』，是生吞活剥，不加消化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，或曰：是『夺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之块垒』。从我们收集整理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的情况来看，『民国西学』是一个比北大『启蒙西学』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认为『五四运动』及其启蒙大众的『西学』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，在北大的『启蒙西学』之外，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『民国西学』。或许我们应该把『启蒙西学』纳入『民国西学』体系，『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』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。

我们认为：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，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，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，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，并非简单的外来『冲击』所致，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。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、立场、方案、主张、主义……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，但都要在理解、消化、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，才会有更好的发挥。在这一方面，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，那便是『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先翻译』。反过来说，『翻译』的目的，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，而非搬用；『会通』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，而是一种创新——『超胜』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。二十世纪的『民国西学』，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，值得我们捡起来，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，好好思考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『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』，献弁言于此，是为序。

2016年3月20日，于阳光新景寓所



〔瑞典〕多桑（C. v. Ohsson）著 馮承鈞 譯

# 多桑蒙古史 （上）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

# 序

多桑書共有七卷。我前以爲西域三大汗國的史事，在舊籍中頗欠缺，在新編中亦多疏誤，故先將後四卷逐譯。後來看見田中萃一郎所譯的前三卷，我又覺得全書仍有翻譯之必要（田中的譯文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十期中已有評），遂又將前三卷轉爲漢文。翻譯時間既有先後，前三卷同後四卷的譯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。比方 *Mohammed* 先譯作謨罕默德，後在前三卷中概從唐譯作摩訶末，就是一箇例子。全書譯竣，我想將後四卷取回整理，不意原稿清樣統已製成紙型，勢須大加挖改，末後祇好聽他，擬在索引中去補救。前三卷有新式標點，後四卷無，也是因爲這種關係。

我從前在第四卷序中說過，多桑書同元史一樣，也有譯名不一貫的毛病。因爲他所本的回教撰述，文字不著韻母，而聲母音點有時脫落，常易相混，所以不特相近的韻母有時誤用，甚至難於互用的韻母，也能混淆不分。聲母之誤如果無他書可以對勘，竟至無法考訂。比方主兒勤之誤作 *Bourkines*，錯了一箇聲母，那牙勤誤作 *Bouca-kines*，竟錯了兩箇聲母，一箇韻母。他最使我感困難的，就是對於 *c, k, g, kh, sh, s* 等聲母毫無分別，例如他譯寫的 *gan*，對音可作干 (*gan*)，又可作堅 (*gan*)，且可作罕 (*ghan, khan*)。這種困難有時還可以用前後文去補救，例如 *Togan*，不難認識是脫歡。可是他有時又將 *ou* 兩箇韻母互用，寫作 *Tougan*，則未免使人猶豫不決，

因爲蒙古人也有名喚禿堅的。像這一類的困難不計其數，我自信尙未能完全將他解決。

此外有些譯名，好像與對音未合，其實不然。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證過若干變例，比方將 畏吾兒 字母中無代表 *g*, *gh*, 等聲的字母，就是兩箇大變例。此外尙有若干爲前序所未及的，條列如下：

突厥語發音之 *γ*，在蒙古語中常變作 *j*。此方突厥語驛站作 *γan*，蒙古語改作 *jan*。突厥語法令作 *γasaq*，蒙古語則改作札撒黑 (*ᠵasaq*)。訛答刺城的守將，殺成吉思汗使者的那箇人，刺失德書名亦納勒出黑 (*Yinaltuq*)，號哈亦兒汗 (*Qayir-khan*)，而在元史則作哈只兒只蘭禿 (*Qajir-Jinaltuq*)。除以蒙古語語尾之 *-tuq* 替代突厥語語尾之 *-tūq* 外，兩箇 *γ* 皆變作 *j*，一箇 *l* 變作 *o*。這種例子舉不勝舉。

蒙古語同西域語常將 *b* 變作 *m*，若乞卜察黑 (*Qibçaq*) 之變作欽察 (*Qimçaq*)，哈卜哈納思 (*Qabqanas*) 之變作愁哈納思 (*Qamqanas*) 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。

蒙古語對於發音之 *r*，常疊用其後之韻母，比方 *Ros* 之作幹羅思 (*Oros*)，*Riazan* 之作也烈贊 (*Arāzan*)，也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。這種譯法同古譯相反，比方宋高僧傳卷三有阿儻真那 (*Ratacina*)，竟將發音的 *R* 簡單刪了，大約是漢語同蒙古語無此發音，所以讀音或增或減。

發音之 *A* 有時省略，比方 *Abu Saïd* 之作不賽因，*Abu Bālt* 之作不別，是見於元史的變例。可是也有帖木兒的後人 *Abu Saïd* 在明史中寫作卜撒因的。看這箇例子，足見收聲之 *-t* 偶亦變作 *-b*。但是這種變例的收聲不常見。

蒙古語尾之 口 增刪無常。若阿勒赤 (Aiki) 亦作按陳 (Aik'in)，河西轉爲合失 (Qasi)，也可變作合申 (Qasin)，月忽難 (Yohunan) 又可作月合乃 (Yohuna-i)，這箇月合乃在元史卷一三四誤作月乃合，諸本元史皆然，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實作月合乃，這箇名稱大概也是從突厥語轉販而來的，在蒙古語中則變作尤忽難 (Jugunan)。

蒙古語常讀 z 作 ʒ，比方將 targan 讀作答刺罕，將 qar 讀作答亦兒，就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。這種讀法好像不是蒙古語所獨有的，從前漢譯 targan 曾作達干，Turkit 曾作突厥。

上面所說這些變例，不但是譯多桑書所應知道的，就是讀元史也是應該知道的。至若我所用以譯寫的漢字，我很想適合當時的讀音。因為翻譯非漢語的人名，固然要求一貫，可也要注意當時的讀法。我曾說過，如要整理元史譯名，必須備具幾種條件，(一)要名從主人，(二)要了解西方北方幾種語言，(三)要明白漢字的古讀，尤要知道元人的讀法。從前整理元史的人，好像多未備具這三箇條件，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離不明。比較以前的整部成績，祇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微合第二第三條件，可是他常將元朝祕史的譯音譯寫近代西文地名，將契丹改作乞壇 (Qitan)，還可以說是乞塔惕 (Qitat) 的單數；將波斯作珀兒昔阿 (Pertia)，也可勉強對付；可是將埃及作類只魄惕 (Egypta)，而不用名從主人之例，作密昔兒 (Miar) 等類的譯法，未免過於刻舟求劍了。但是比較其他改修的元史，總算強多了。現在學界種毒最深的，要首數元史譯文證補的譯名洪氏，赫奎不問上述的三箇條件，同元代譯名的那些變例，對於元史名稱妄加改竄，比方譯 Catchoun 作哈準，而不用元譯的合赤溫或哈赤溫；譯

Nogai 作諾拔，而不用元史屢見不鮮的那海或那懷，自以爲新，其實錯了。古人翻譯，很明瞭漢字的讀音，比方聖武親征錄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將，譯名作三木合拔都，後又作三合拔都，此人的原名是 Sammuga Ba'atur，翻譯的人用「三」，（古讀 am，今粵人尙作此古讀），照顧到第二箇字的發聲。這種譯法就是從前佛經的譯法，也就是元朝祕史的譯法，不像今人隨便用本人鄉土的方言，同似識非識的漢字，譯寫外國語言名詞之亂。所以元史中的譯名雖不統一，除開過於省譯之名稱外，皆不難復其原名。至若元史譯文證補一直到新元史的譯名，能够還原的恐怕很少。

我所用的標準譯字，多從元朝祕史，然而並不認定元朝祕史是一部完全不誤的譯文，其中也有些傳寫的錯誤。比方將你沙不兒 (Nisabur) 寫作亦薛不兒 (Isabur)，將亦刺合 (Iqa, Ilaqa) 寫作你勒合 (Nilqa)，可以說是音點不明，致有此誤。可是殺乃蠻王子古出魯克（屈出律）的地方作撒里黑昆 (Sariq-qun)，證以近來發現的蒙文祕史殘本，實是撒里黑豁勒 (Sariq-xol) 之誤。如此改正方與蒲犁縣之土名相合。這類版本的錯誤，史中尙有不少，所以我雖採用此書，可不絕對盲從。

舊譯名除開過於省譯的名稱，像忽亦勒答兒 (Quidar) 元史作畏答兒的例子外，我皆盡量採用，決不自己心裁，妄易新翻。元代載籍所無之人名地名，而有舊譯者，則用元代前後之古翻，如隋唐之范延，明史之帖必力思之類。亦不別用新名，不用今讀之字譯古名，也不用古讀之字譯今名。凡原名初見者，皆附西文原名於下。可是對於多桑書所採乾隆時妄改的名稱，根本既有錯誤，西文譯寫之名除不誤者外，概從刪棄。好在多桑書的精華全在回教

著作，他所轉販的那些漢籍副料（以續通鑑綱目爲最多），應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整理。

多桑書所引刺失德書很多，而刺失德書同聖武親征錄並出一源。在刺失德書未直接轉爲華言以前，我覺得多桑書是一部很好的參考史料。比方親征錄所載木華黎率王孤、火朱勒、忙兀、弘吉刺，亦乞刺五部，以及契丹、女真之兵南侵中國一文，其中的火朱勒部，久之未詳其對音爲何，今觀多桑書，知爲 Gosiqol。然則親征錄原譯或是火朱勒矣。刺失德書（Berezin）本數見此名，說是每十人隊中挑選二人組織成的軍隊，此說頗類真相，因爲此字的字根是 os，突厥語猶言雙也。此姑就以多桑書校正中國史錄而言。反一方面說，也可取中國史料校正多桑書。茲舉一例爲證：多桑書第一章第二章有箇部落，名稱曰亦勒禿兒斤（Ilurkine），後在附錄中亞部族表中，又作亦勒都兒斤（Ilurkine），檢元朝祕史卷六相對之文（葉本三十一頁），王罕有箇使臣名亦都兒堅（Idurgan），後（四十九頁）同一人又作亦禿兒堅（Iurgan），也是一名兩種寫法，姑不問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，要可以元朝祕史的名稱改正多桑書之誤。

我譯多桑書時，很想作一種互證的工作，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，可是費時也很久。如此做下去，恐怕幾年也譯不完，後來祇好譯而少證。

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譯寫方法，除引用多桑原文外，皆用新法。因爲多桑書之壘床架屋的譯寫方法太累贅，並可發生誤會。比方谷兒只王 Isaoha，蒙兀兒史記西域傳誤讀作辣思伽，其實應作刺沙。（承襲此人王位的魯速丹，就是刺沙之妹，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認清是何人，蒙兀兒史記誤作刺沙之甥女，新元史誤作刺沙之弟婦，大約

是習於中國觀念，以爲祇有弟媳攝政，那有姑奶奶當權，是不特不明西史，而且並 *Howorth* 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。若是用新法寫作 *Tata*，就不致於發生這類的誤讀了。我譯多桑書常想將他的譯名修改。可是他的寫法無一定標準，有許多名稱很難判別，末了祇好聽他。僅在漢譯名中略爲變通。所以 *ᠠᠨᠢ* 常譯作「亦」而不作「只」。再者多桑的譯名皆作「法語化」，比方蔑兒乞惕已經是蒙古語表示多數的名稱了，應該寫作 *Merkit*，可是他寫作 *Merkites*，另外又添了一箇法語多數，弄成畫蛇添足。要是遇見一箇翻譯匠，一字一音地當作英文讀去，恐怕最博識的考據家也無從考見真相了。這也是讀多桑書應該注意的一點。蒙古語表示多數的語尾固然是 *-ᠠ*，元祕史寫作「惕」，可是因爲採用別的语言，或因他種原因，有時多數作 *-ᠢ*，元祕史寫作「思」，「兒」，「勒」。比方南家思 (*Nankiyas*)，速勒都思 (*Suldus*)，巴魯刺思 (*Barulas*)，用「思」而不用「惕」，札刺亦兒 (*Jalair*)，塔塔兒 (*Tatar*)，用「兒」而不加「惕」，撒兒塔兀勒 (*Sarta'u*) 就是回回，用「勒」而不改「惕」，皆可爲證。我還疑心有 *-n* 字作多數的，晃豁壇 (*Gongotan*) 的多數固作晃豁塔惕 (*Gongotai*)，*-ᠨ* 顏 (*Qiyān*) 的多數固作乞牙惕 (*Qiyat*)，爲甚麼乃蠻 (*Naiman*) 不作乃馬惕 (*Naimat*) 呢？元代固有乃馬台 (*Naimatai*) 乃馬真 (*Naimajin*) 的人名，這不過是蒙古語變化的屬格，不足證明他是多數。檢通元祕史，竟未發現乃馬惕的寫法，不論單數多數，皆作乃蠻。要說乃蠻是數目字，(此言八)爲甚麼朵兒邊 (*Dorbān*) 此言四，亦是部族名)有朵兒伯惕 (*Dorbāt*) 的變化呢？若要解決這件問題，非比較阿勒台 (*Altaiquas*) 系語言不能得到答解。我所舉的這些例子，無非使人知道蒙古語多數不僅用惕，切莫仿效蒙兀兒史記，不但將蒙古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，而

且將非蒙古語的多數，甚至將梵語的多數，一概變作錫。

我這些批評，並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見己長，不過是因為有幾部書已經具有「威權」。我譯本書撰者 C. D. O'H. 的名稱，不敢規矩譯作宋松，而仍用舊譯的多桑者，也是受了這種威權的影響。這些具有威權的撰述，不能說全書皆好，當然有些缺陷，我無非指明這點缺陷，使參考的人不致沿襲其誤而已。除開此點以外，我以爲別本津本的刺失德書未重譯以前，元史譯文證補一書是可以參考的，成吉思汗實錄蒙兀兒史記二書，也是治元史的人離不開的佳作。

我譯此書也不敢說好。從前在評田中所譯多桑書一文中，曾經說過：「多桑書中錯誤散見，欲改之則與原文異，不改則與事實遠，無論何人譯是書，終不免吃力不討好。」所以多桑書出版逾百年，尙無一人敢有翻譯全部的勇氣或傻氣。我今竟敢將此書全部轉爲華言，祇望讀者諒我膽量之大，不敢望讀者譽我譯筆之工。二十三年四月十日馮承鈞識。



# 目錄

## 第一卷

### 緒言

### 第一章

中亞之遊牧民族——突厥與韃靼之古國——其與中國之關係——十三世紀初年之中亞——此時代之韃靼種民族及其所居之地域——其風俗

### 第二章

蒙古人之古代傳說——成吉思汗之祖先——成吉思汗少年時代之事蹟——其長數部——其初諸戰——其與克烈汗之關係——克烈部之略誌——鐵木真與王罕合攻數種遊牧民族——兩王之結怨——鐵木真之敗——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語——王罕之敗——其死——鐵木真之戰勝乃蠻部——乃蠻王之死——蔑兒乞部之降附——塔塔兒部之滅——鐵木真之侵入唐兀——此圖之略誌

### 第三章

大會——鐵木真稱帝號成吉思汗——二侵唐兀——乞兒吉思與撒麻州之降附——斡亦剌之降附——討伐屈出律與脫脫——三侵唐兀——畏吾兒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

### 第四章

成吉思汗之親金——契丹或遼國——女真或金國——成吉思汗之遣兵中國——侵入山西直隸——金兵之敗——遼東契丹之叛